

RUSSIAN AND SOVIET FACTORS IN THE COURSE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 A CASE STUDY OF
GUO MORUO'S RELATED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中的俄苏因素
——以郭沫若相关文史材料研究为例



<https://doi.org/10.24412/2181-1784-2025-26-405-423>

周倩, 兰州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Zhou Qian,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Lanzhou University

2486126036@qq.com

Anno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Sino-Soviet interactions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Guo Moruo emerged as a pivotal figure. As one of the foremost modern Chinese writers to arise from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he was among the earliest intellectuals to engage with Russian and Soviet ideological frameworks. Throughout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Guo actively facilitate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His extensive dialogues with diverse representatives in the Soviet Union, coupled with his visit there in 1945, enriched his understanding of its social system and cultural heritage, thereby shaping his perception of what can be termed as "the Soviet image." Follow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uo Moruo embraced dual roles as a leader within China's cultural sphere and a diplomatic envoy, dedicating himself to fostering cooperation in cultural domains between both nations. Consequently, by examining Guo Moruo's historical materials pertaining to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alongside an analysis of his reception of their ideological concepts, perceptions regarding their societal experiences and systems, as well as his stance on Sino-Soviet cultural exchanges—it becomes feasible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into how Russian and Soviet influences have permeated China'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This study seeks not only to illuminate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dimensions but also delve into deeper authentic Sino-Soviet relations during that era while extracting valuable historical insights for providing inspi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micable, good-neighborly, and mutually prosperous cooperative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 Sino-Soviet relations; Guo Moruo; Russian Literature.

摘要：在 20 世纪的中苏联系与交流中，郭沫若曾担任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新文化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重要作家，他是最先接触到俄苏思想理论的现代知识分子之一。抗战时期，郭沫若积极推动中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苏联各界人士的频繁交流及 1945 年出访苏联的经历，让他对苏联的社会体制和文化积淀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知，塑造出郭沫若视野中的“苏联形象”。在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以中国文化界的领导人和外交使者的双重身份投入到中苏两国文化领域的合作。因此以郭沫若涉及俄苏及中苏关系的文史材料为研究对象，将他对俄苏思想文化的接收、对苏联经验与社会体制的观感、对中苏文化交流的态度作为突破口，能够切实考察出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源自俄苏的影响因子。不仅在政治外交层面，也在深层次的精神文化层面，探知当时真实的中苏关系，并从中汲取历史经验，以求对今后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合作共赢关系的发展作一启示。

关键词：中苏关系；郭沫若；俄国文学。

自“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俄苏的理论思想、价值观念、革命经验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成为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思想组成部分和文化建构资源，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思想解放和价值导向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远且具有持续性的重大影响。在 20 世纪中国整个现当代历史进程中，与俄苏之间在各个不同领域的交流互通，以及与俄苏政治外交关系的嬗变，其影响都直接作用并反映于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变革与进步。因此，通过考察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中的俄苏因素，尤其是在社会建设、文化思想方面占据重要位置的来自俄苏的影响因子，以此观照在这些领域中中苏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从这一角度来探究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回望现代化的建设历程，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及正确认识和应对当下的现实问题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五四”前后俄国文学的传播接受与十月革命的路径指导

近代以来随着国门洞开、列强入侵，中国在社会落后、民族危机状态下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历经器物、制度、思想三个层次的方向探索，走向世界，取法西方，找寻社会变革、民族复兴的出路。中国早期的现代知识分子作为历史的中间物、时代变革的亲历者，受困于第三世界国家物质的匮乏，封建社会制度的压迫，产生极大的精神苦闷和情感压抑。此时俄国文学的翻译和引进，便为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建构起纾解苦闷情绪、觉醒自我意识

的文学世界，作品文本所承载的超越文学边界的社会政治意义及思想价值，也为广大中国青年破解现世社会问题、找寻未来发展出路提供了良方和路标。

鲁迅曾在 1932 年 12 月发表于《文学月报》上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谈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文学逐渐传入中国时的境况，当时一部分中国青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寻切实的指示”，“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文中对彼时译介俄国文学的盛况作了介绍，“俄国的作品，渐渐的介绍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零星的译品且不说罢，成为大部的就有《俄国戏曲集》十种和《小说月报》增刊的《俄国文学研究》一大本，还有《被压迫民族文学号》两本，则是由俄国文学的启发，而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点出‘被压迫’的字样来了。”[李新宇 2011:179]据苏联文学专家戈宝权考证，自二十世纪初到“五四”运动以前，“当时我们已介绍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十几位俄国作家的作品约八十余种以上，其中托尔斯泰即占将近三十种……无论从总的数量上来说，还是从选择的作家和作品的代表性来说，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介绍外国文学的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戈宝权 1991:79-87]，而到“五四”运动之后，如鲁迅所言，俄国文学更广泛更大量地被引进中国。俄国文学所揭露和传达的被压迫者的生存真相与反抗意志，令当时处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重压之下的中国读者感同身受，他们也在阅读与接受的过程中，获得了直面时代风潮，看透社会真实，认知自我存在的广阔视野和深刻意识。

作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坛上涌现出的两大文学团体之一——创造社的核心成员，郭沫若同样受到引进俄国文学的热潮影响，投身于俄国文学的译介工作中。在 1921 年从日本归国途中，郭沫若经由成仿吾初次接触到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处女地》两本小说的德译本，他在船上读完《处女地》这部小说，寓居上海时期又与成仿吾再次同读，并最终耗时四十天将其译完，仍采用德译本的译名《新时代》于 1925 年出版。出于对屠格涅夫文学作品的喜爱与推崇，他此后又再译屠格涅夫的五首诗，并收入 1928 年创造社出版的《沫若译诗集》。

郭沫若曾在写给成仿吾的信中提及他在阅读《新时代》的同时进行自我认知、自我审视的结论，他认为自己与主人公涅暑大诺夫存在相似性，“我们

都嗜好文学，但我们又都轻视文学；我们都想亲近民众，但我们又都有些高蹈的精神；我们倦怠，我们怀疑，我们都缺少执行的勇气，我们都是些中国的‘罕牟雷特’，我爱读《新的一代》这书，便是因为这个原故”[郭沫若 1989:17]。在阅读的过程中，处于相似的社会压迫及矛盾冲突之中的涅暑大诺夫成为了一面镜像，映照出作为读者的郭沫若，自身在思想意识、行动意志上所存在的缺陷。对自身缺陷的认知和审查，也促使郭沫若重新确立身份抉择与实际行动的决心，突破哈姆雷特式的思考与行动这一命题的延宕状态，重启契合社会需求的自我建构——“我译成了这部书后，把我心中的‘涅暑大诺夫’枪毙了”[郭沫若 1925:1]。

这些俄国文学作品所发挥的作用，不仅在于促进接受者精神与心灵层面自我的重新认知与建构，更在于其中包含的超越文学的广泛社会政治内容，所起到的影射社会现实的意义。这类文本不仅是一面给予读者使其审查己身的镜子，也是一面映照出历史现场和社会境况的镜子，正如列宁称列夫·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郭沫若在《新时代》一书中体悟最深的印象，正是其中“流动着的社会革命的思潮”，“涅暑大诺夫的怀疑，马克罗夫的躁进，梭罗明的精明，玛丽亚娜的强毅，好的坏的都杂呈在我们青年男女的性格中”[郭沫若 1989:18-19]，他在书中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广大的中国青年群体，看到他们在各类思潮争相涌动的社会转型期，作出不同的立场选择，走上不同的道路。

郭沫若以切近现实的思考方式对《新时代》作了详尽的政治解读：“社会革命的两个主要的条件：政治条件和物质（经济）条件；屠格涅甫认得比较鲜明。他把马克罗夫代表偏重政治革命的急进派，把梭罗明代表偏于增加物质生产力的缓进派。他促成了马克罗夫式的失败，激赏着梭罗明式的小成。”郭沫若并不赞同屠格涅甫的观念，转而“枪毙”涅暑大诺夫式充满犹疑的诗人革命家，选择马克罗夫式的暴徒革命者，这正是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经验用事实证明了暴力革命的可行性，为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与道路抉择提供了实证支撑。“五十年后的今日，成功的却是马克罗夫，‘匿名的俄罗斯’成为了列宁的俄罗斯了。屠格涅甫的预言显然是落了空！”“我们所当仿效的是屠格涅甫所不曾知道的‘匿名的俄罗斯’，是我们现在所已经明了的‘列宁的俄罗斯’。”[郭沫若 1989:18-19]

郭沫若在思想转变与道路探索期间，曾参与“孤军派”“醒狮派”等国家主义者的交流与论争，阐发自己对于国家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建设的构想，将苏俄在 1921 年 3 月开始实行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经济政策”作为自己理想构

思的一部分，在孤军派关于中国经济路线的长期讨论中，坚持主张“采仿苏联的办法厉行国家资本主义”[郭沫若 1992:274-275]，其中郭沫若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理念构想正是来源于列宁。

学界普遍认为郭沫若是在译介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先驱河上肇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这一过程中，推动其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换与革命导向。郭沫若本人在当时致成仿吾的书信中也自述“这书的译出在我的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我对于作者非常感谢，我对于马克思、列宁非常感谢。”[郭沫若 1989:10]但实质上郭沫若在当时并非全盘接受了河上肇的理论，而是经由其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这一中介，触及了他更为认同的列宁的理论主张与思想论断。郭沫若曾提及“我对于这书的内容并不十分满意，如他不赞成早期的政治革命之企图，我觉得不是马克思的本旨。”[郭沫若 1989:10]于是根据孤军社的何公敢所提供的 *Soviet Russia* 杂志上所刊载的列宁的《政治革命后俄罗斯之经济的地位》完整版本，对河上肇的翻译作了校改和补充，在自己的译本中较为完整地传达与呈现了列宁的理论阐释，并在文末的附白中专作情况说明：“此文于社会革命之道途上非常重要，故人对此颇多误解，有人以为列宁改宗，遂援引为例，欲于中国现状之下提倡私人资本主义者，这真是侮辱列宁，遗害社会了。译此文竟，倍感列宁之精明和博大，追悼之情又来摇曳心旌，不禁泪之潸潸下也。（民国十三年七月一日夜半校改后志此）”[河上肇 1925:288]

列宁关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成为了郭沫若重要的理论资源，他同样赞同列宁对社会革命的阶段划分：“第一是准备（宣传）时期，第二是战斗时期，第三是产业经营时期”[郭沫若 1989:18]。结合他对《新时代》的翻译成果，他认为俄国的革命实际表明着第二阶段的胜利，而第三阶段的发轫仍需推进梭罗明的道路，增进物质生产力以求富裕。由此在对屠格涅夫借由文学作品建构的政治想象与列宁通过历史实践传达的理论经验进行批判接受后，郭沫若初步形成了在产业后进的国度，先通过政治革命使无产者取得政权，再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增进物质生产，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路。郭沫若对十月革命性质与成果的理解，对苏联生产关系结构、社会体制建设、社会发展现状的认可，对列宁主义及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推崇，反映着当时部分知识分子群体在看到十月革命的成功之后的真实心境。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与苏维埃政权的成立，用实践证明革命的可行性和必然性，在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中激发革命情绪与革命意志，十月革命作为实

践行动的成功范例，成为一种希望的符号与图腾。列宁曾被反对暴力革命者视作“暴徒”，但此后更多的人开始将他的理论主张视作行动纲领，进行思想武装，破除自身思想的迷雾，打破心境中时代造就的苦闷，指明自己前进的道路。正如郭沫若所言：“科学的社会主义所告诉我们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代，我相信终久能够到来；‘个人之自由发展为万人自由发展之条件的一个共同体’，我相信是可以成立的。这种时代的到来，这种社会的成立，在我们一生之中即使不能看见，我们努力促进它的实现，使我们的同胞得以均沾自然的恩惠，使我们的后代得以早日解除物质生活的束缚而得遂其个性的自由完全的发展，——这正是我们处在这不自由的时代而不能自遂其发展的人所当走的唯一的路径呢！”[郭沫若 1989:8]

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指导与推动下实现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在 1918 年为《新青年》杂志写的《庶民的胜利》中写道：“1917 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李大钊 1984:595]，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曾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祝贺俄国革命的胜利——“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一个大希望”[孙中山 2006:225]。郭沫若也曾说过“应该感谢十月革命。它唤起了当年的青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对于新社会产生了作进一步了解的要求”[郭沫若 1983:139]。来自俄国的革命经验及列宁主义为歧路彷徨而找寻不到出路的广大中国青年提供了思想纲领，为其参与社会实践、投身社会革命提供了行动指南，更为深陷精神苦闷中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提供了革命的信仰，以及未来社会蓝图的愿景，最终促成了中国早期左翼知识分子群体的发展与壮大，极大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

作为新文化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重要作家，以及最先接触到俄苏思想理论的现代知识分子之一。郭沫若对俄国十月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经验汲取，对列宁主义的接收领悟，都融汇于他的诗歌创作和文章评论中。例如在被誉为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的作品《女神》中，就反复出现倡导“全人类都是我们的同胞”，作为“文艺革命的匪徒”，“反抗贵族神圣的文风，不得善终的托尔斯泰”，以及呐喊“为阶级消灭而战哟！为民族解放而战哟！为社会改造而战哟！”[郭沫若 1982:112-115]，作为“社会革命的匪徒”，“亘古的大盗，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郭沫若 1982:117-119]等俄国伟大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尤其在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群体及学生群体中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历史的演进，对俄国思想文化资源的汲取，也直接影响到新文学界对于文艺的见解转变，推动大部分文学创作者不再过多纠缠于文艺

形式与技巧问题的争论，而以文艺所承载的内涵及精神为主要目的，即实现从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这一进程，力求发挥文学反映现实并反作用于现实的影响力、号召力、感染力，关注其宣传与教化作用。

二、抗战时期中苏文化交流与访苏游记中的“苏联形象”

1931 年日本发动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使得远东地区的国际关系发生急剧变化。中苏两国面临东西方法西斯势力这一共同的敌人，为维护各自国家领土安全以及世界和平，在抵制西部德国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同时，遏制东方日本疯狂扩张的入侵势头，双方自觉淡化此前的政治之争，寻求协作联合抗击法西斯势力。1932 年中苏达成复交，逐步调整两国关系，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后不久于 8 月 21 日，王宠惠与鲍格莫洛夫分别代表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中苏两国正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苏联不仅在作战物资及技术指导上为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大量切实有效的援助，也在革命精神与人道主义关怀层面给予中方同情与鼓舞。两国不仅在军事、政治与外交层面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也在不断促进双方文化联络与交流活动的开展，例如 1935 年在南京发起成立的中苏文化协会，便是受中苏两国官方支持的一个文化交流的民间组织。中苏文化协会及其会刊《中苏文化》以促进中苏文化交流、增进中苏友谊为宗旨，存续时间长达 14 年之久，产出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活动及成果，对中苏之间的交流互通、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中苏文化协会章程载明其主要事务为：“1.介绍苏联学者来华讲学；2.介绍中国学者赴苏联讲学；3.举行关于中苏文化之讲演及展览会；4.出版关于中苏文化刊物；5.举行各种促进中苏人士友谊之集会；6.赞助国内人士赴苏联留学或考察游历事宜；7.赞助苏联人士来华留学或考察游历事宜；8.设立图书馆，搜集有关中苏文化之书籍及定期刊物等。”[王锦辉 2010:24]自 1937 年 12 月迁至抗战大后方重庆并进行改组后，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在通过电台广播、影视资料及文艺展览向苏联介绍悠久文化历史，输出中国抗战文化的同时，不断引进苏联的文化资源，通过举办联谊会、展览会、音乐会，开办讲座、放映苏联影片、译介苏联文学作品及革命理论成果，向中国人民普及苏联在军事、政治、经济、科学研究、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果，引发热烈的社会反响。

中苏文化协会的会刊《中苏文化》作为介绍、宣传苏联的主要阵地，将

来自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协会持续寄送的苏联刊物作为可靠稿源，“保证了中国社会能及时而全面地了解苏联社会，苏维埃宪法、苏联农业集体化对农业的影响、苏联工农业发展的成就以及科学研究的新成果等信息都迅速而全面地通过《中苏文化》传达到中国民众之中。”[李玉贞 2005:5-12]此外，中苏文化协会的成员组建及实际运作呈现出明显的抗战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国共两党人士和政界要员、文化名人都经常为其杂志撰稿，杂志也常刊登中苏两国领导人的言行，这使其成为了了解苏联社会发展情况和中苏关系动态变化的重要窗口。

中苏文化协会自成立后在组织上不断扩大规模，先后在上海、兰州、长沙多地建立分会，广泛吸纳著名社会活动家、具有影响力的文化界进步人士等加入协会担任组织内重要职务，这其中便包括郭沫若。郭沫若于 1937 年 7 月归国参加抗战，1938 年 4 月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同年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40 年 9 月为抗议国民党政府强行改组政治部，辞去第三厅厅长职务，11 月再任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组成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同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积极组织与动员下，郭沫若、阳翰笙、翦伯赞、侯外庐等共产党员纷纷加入中苏文化协会并担任要职，确保杂志的“亲苏”倾向，“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事实上控制了中苏文化协会、《中苏文化》等的领导权。”[王锦辉 2010:1]

这一时期的郭沫若已然在文艺界享有很高声誉及名望，1941 年在周恩来提议下由文艺界联合举办“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和五十寿辰”庆典活动，中苏文化协会同样参与其中。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专文《我要说的话》，将郭沫若确定为继文坛巨擘鲁迅之后的“革命文化的班头”[周恩来 1941]。因此在这一阶段，郭沫若以文化旗手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与社会建设，更加深入地学习苏联经验，切实为中国社会在现代转型时期，思想意识及精神文化的重新建构做出贡献。他积极推动中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苏联各界的往来函电增多，为《中苏文化》杂志撰稿，参加纪念十月革命以及纪念高尔基、托尔斯泰等重要作家的大会，并为此发表诗歌和演讲。

1940 年 5 月 20 日，郭沫若为《中苏文化》撰写题为《中苏文化之交流》的文章，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艺发生发展过程中所接受的俄国文学影响作了回顾，在他看来，“如以小说而论，俄国文学的影响，无疑地是占着领导的地位。俄国旧时代的主要作家的主要作品大抵是被翻译了”[郭沫若 1949:2]，中国新文学创作者对于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

诃夫等作家作品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越了传统文学中的古典名著。其中高尔基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流传之广、影响之大，更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影响径直是超文学的。他被中国的作家们崇敬、爱慕、追随；他的生活被赋予了神性，他的作品被视为了《圣经》，尤其是他的《文学论》，对于中国的影响是绝不亚于在苏联本国。文艺工作者的生活态度和创作过程，普遍而深切地受着了指示。我们借此不仅可以知道应该如何去创作或创作些什么，而且还学会了应该如何生活或成为一个怎样的人。高尔基在我们文艺工作者的精神上所占的地位，在中国长远的文艺史上，似乎还找不出一个人可以和他匹敌。”[郭沫若 1949:3]

郭沫若对高尔基的评价之高，侧面反映出高尔基对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尤其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坛的影响之大。高尔基的文学作品中深刻的人民性内涵与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以及其间承载着的革命激情、乐观精神、政治意识与社会责任感，正契合当时中国抗战救亡的时代主题。另一方面，他在《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一文中，重新确立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平等关系，并对浪漫主义作了重新评价与阐释，将其分为消极的（否定的）浪漫主义和积极的（肯定的）浪漫主义，提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观点——“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象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合流的情形是我国优秀的文学突出的特征，它使得我们的文学具有那种日益明显而深刻地影响着全世界文学的独创性和力量。”[高尔基 1978:163]高尔基对积极的浪漫主义的认可，在中国文坛引发新浪漫主义的风潮，郭沫若也在其文艺主张的影响下，在抗战时期重新肯定并复归浪漫主义。1936 年在接受蒲风的访谈时，郭沫若就当时文坛关于现实主义与新浪漫主义之争阐发了这一观点：“新浪漫主义是新现实主义（高尔基所说的‘第三现实’）的侧重主观情调一方面的表现，和新写实主义并不对立。新写实主义是新现实主义之侧重客观认识一方面的表现。”[郭沫若 1936:52-55]在 1942 年 5 月 30 日于中苏文化协会所作的演讲中，他再次重申这一观点，并强调高尔基对此所做出的贡献：“不过苏联也并不是一切都能尽满人意，从前也有过一种坏的风气，有一种人专门用一种固定的公式来衡量作家的作品，即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这种风气曾经流到过中国和日本。……所以苏联自高尔基的指示出现以后，把这种公式加以清算，将文艺从这个圈套里解放出来了。高尔基在苏联提倡新现实主义，给予作家无限的生路与无限的自由。我认为作家能够尊重现实，并能精益求精，深益求深，广益求广地作研究，适宜于浪漫主义的，就让他写浪漫主义的东西；他适宜于

现实主义的，就让他写现实主义的东西，不要拿什么公式或圈子加以范围、限止，那是会有很好的成果的。”[郭沫若 1949:28]

郭沫若在谈及俄方在文学、艺术、历史研究、政治制度、军事机构、生活习惯等各方面对中国产生的全方位影响同时，也指出中苏文化交流中所存在的不足，他在《中苏文化之交流》一文中写道：“由苏联介绍到中国来的作品可以说是洪流，由中国介绍到苏联去的作品似乎只有一条溪涧”[郭沫若 1949:4]，郭沫若不满于近似于单方面接受的交流模式，更不满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现状，“我们不仅是落在世界伟大作家的后面，而且是落后在近二十年来的中国的伟大事件的后面”[郭沫若 1949:5]，现代文学的创作并未能紧随时代潮流的发展，反映出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现代历史的伟大事件，向全世界呈现出中国的现实与中国的发展。该文经《中苏文化》杂志刊登后，经由苏联人士的翻译刊载于《文学报》上，在苏引发极大同情与反响，“苏联研究中国学术的权威即曾将儒林外史译成俄文的伊文先生，就用洪流与溪涧的题目作过一篇文章，在苏联文学报上发表”[郭沫若 1949:20]。苏联作家协会也于1940年7月31日致信郭沫若，对他所提意见表示赞同，并附赠来自俄罗斯、乌克兰、乔治亚、阿美尼亚、阿塞拜疆、卡尔米克乌兹别克斯坦等民族的文学作品，“让我们互相交换写作的经验，并以共同努力来更进一步推进中国人民与苏联各民族的文学的进展罢。我们对你们所提出的关于加强中苏作家之间的文化关系的建议，将给以最大的注意。”[郭沫若 2009:1-13]这一问题的提出一方面更进一步推进中苏之间的深入交流与互动，另一方面也激励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活动，以及文艺政策的变革与进步。

郭沫若将与中苏文化协会相关的文稿，与苏联文艺工作者的通信，为纪念高尔基、契诃夫、托尔斯泰、普希金等作家所作文章，为俄国作家译著、反映苏联情况与中苏关系的著作所提序文，对俄苏影视及文学作品的心得感想以及关于苏联问题的讨论文章收集整理出一本书册，以《中苏文化之交流》为题于1949年6月出版。他在序言中明确表达了希望效法苏联的观点：“中苏两国的关系，特别是文化的交流上，今后是会愈加密切的，苏联的民主文化，有一日千里之势的进程，而我们应该向苏联取法的地方实在很多”，“苏联的文化毫无疑问，在某些方面已经驾过英美，在不久的将来，在一切方面都会驾过英美的。我们只要不想落后，无论社会科学方面或自然科学方面的朋友，都请注意到这件事情。”[郭沫若 1949:1-2]这一书册在建国前夕出版，正反映着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对建国蓝图的构想中，希望取法苏联的心态倾向。

与苏联各界人士的频繁交流及 1945 年出访苏联的经历，让郭沫若对苏联的社会体制和文化积淀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知，他将自己的心得体验如实记录于各类文稿信件及游记《苏联纪行》中，塑造出郭沫若视野中的“苏联形象”。如果说前期郭沫若经由对俄国文学与思想理论的接受，完成其个人的立场选择和自我建构，而在真正深入到真实存在的苏维埃政权国家后，他所触及的就是能够转化为现实的民族国家想象，现代化社会图景范本，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设计蓝图。

《苏联纪行》是郭沫若 1945 年 6 月 9 日至 8 月 16 日赴苏联访问的日记，最初连载于 1945 年 10 月 10 日至 1946 年 1 月 22 日期间重庆的《新华日报》，1946 年 3 月作为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研究丛书”由上海中外出版社出版。其间记载 1945 年 5 月 28 日的晚上，苏联大使馆的费德林博士捎来信件，告知郭沫若受到苏联科学院邀请，参加第二百二十周年的纪念大会。此次大会除法西斯国家外的各国学者都受到了广泛邀请，中国受邀参加的学者除郭沫若外，还有时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丁西林。丁西林先生兼有物理学家和剧作家的身份，是“五四”以来致力于喜剧创作的很有影响力的剧作家之一。在物理研究方面，他在建设北京大学物理系、中央研究院及创建该院物理研究所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长期担任繁重的领导工作的同时，兼顾科学研究的推进。丁先生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文理兼备的身份背景，以及在个人科研之外也承担重要的社会职务的个人情况，侧面反映出苏联在确定邀请人选时的衡量标准，而郭沫若作为文化名人的声誉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也得到了苏联方面的认可。

郭沫若访苏时期亲历中苏文化及学术交流的现场，被列宁格勒的市长称作“中国人民的代表”，受到热情款待。他所接触到的学界权威、文化名人等苏联人士，都以一种站在全人类的共同立场上，平等包容的博大胸怀接纳他的到来，使其感受到人道主义的关怀。“我曾经飞到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中央亚细亚的塔什干、撒马尔罕；又游览过托尔斯泰的故居雅斯拿雅·坡里雅拿；参观了好些研究所、博物馆、工厂、集体农场、大学校、中学校、幼稚园；欣赏了话剧、歌剧、木偶剧、音乐、跳舞、绘画；把晤过好些工人、农人、学者、作家、艺术家、工程师。在苏联足足滞留了五十天。时期虽然并不算长，但所看到的似乎比住了五十年的人还要多。”[郭沫若 1992:266]

郭沫若在苏联看到国家对科学院院士等“文化英雄”的表彰，感慨于“苏联并不单是红军的国度，而同时是学者的国度”[郭沫若 1992:331]。亲见工人村落中工人享有的文化娱乐场所及自然优美的休息环境，赞赏社会主义国家工

人所得的福利待遇，“‘工场内的设备，英美人可能办到，或许有的还要更加完善；工人村的设备便为英美人所无法企及。’——这很明显的，便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前者是资本家做主人，而后者则主人就是工人。”社会主义制度为工人生活与工作提供足够的保障，使其能够“真正了解人生必要的娱乐”，“要求正当的享受”，并获得接受更高等教育的学习机会[郭沫若 1992:368]。

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推动大规模有计划的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后，苏联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逐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在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之后，更是改写了战后的世界格局，跃升为超级大国。在全球性的“红色三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下，全世界范围的知识分子群体都被苏联所建立的，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国家新制度、新形态所吸引。在三十年代的中国，随着愈来愈多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及社会名流赴苏访问与考察，中国语境中的苏联形象转向更为美好、进步、积极的一面。苏联通过邀请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中国学者、文化界人士赴苏访问，试图建构起现代旅苏知识分子对苏联的乌托邦想象，为中共及左翼知识分子建国设计的蓝图提供一个由历史实践所支撑的现实方案。

在苏方的着意安排下，郭沫若重点参观了抗击法西斯势力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战场，和已然实行集体农庄制度的中亚的塔什干，他不仅看到苏联工业化、农业化的丰硕成果，认识到其生产制度的优越性，也看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团结与平等，感知到源自人民的精神力与创造力。“我们看到苏联红军的英勇，而同时也看到了苏联人民和苏联学者的英勇。尤其在我自己，因为是中国人的缘故，更增加了无限的景仰和勇气。中国还在日寇的铁蹄下，为什么我们不能象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们一样，把祖国解放出来？中国也建设了三十多年，为什么我们不能象乌兹别克的人民一样，把祖国建设成和平幸福的国家？能够的！但需要一个前提，便是国家要真正成为人民的国家，人民然后才能够拿出自己的力量。”[郭沫若 1992:386]“在郭沫若的记述中，苏联呈现的是一个富强、平等、尊重文化、热爱艺术的形象。但这并不是俄罗斯的民族形象，而是制度和主义的形象，即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刘奎 2019:328]郭沫若抱着“唐僧取经到西天去的精神”，带着对中国出路问题的疑惑与焦虑来到苏联，而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展露优越性的“苏联形象”，给予其解决祖国内忧外患及发展难题的参考方案。

郭沫若在归国后就访苏见闻、感想及收获作了多次报告，“朋友们很关切，在种种场合要我作报告，我作过了，而且翻来复去地作过了。朋友们不

能满足——事实上是我不能使他们满足，还望我写些东西出来。大约以为我还有什么好的资料保留着的吧。我现在索性把我这几十天的日记倾箱倒篋地整理出来，作为芹献。”[郭沫若 1992:267]这一情况再次反映出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憧憬，好奇及向往的心态。郭沫若作为文坛向导式的人物，其影响力与号召力毋庸置疑，“听他介绍苏联情况的人就远远超出文化界，而是跨越不同的团体和阶层，包括民主党派、实业界、工商界、妇女团体、大学师生及受报刊影响的读者大众等。”[刘奎 2019:340]在 40 年代关于如何建国，亲苏或亲美的立场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资本主义道路的分歧这一社会大讨论的历史背景下，这无疑为选择苏联道路作了有效宣传。苏联对于中国现代的历史走向、道路选择，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信仰与立场抉择，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三、建国后中苏关系嬗变与郭沫若的苏联观

1949 年 10 月 3 日，中苏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中苏关系形成于冷战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垒的国际环境中，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中苏关系在全面友好的大背景下发生着微妙的波折与变动，这一嬗变过程在潜移默化间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及社会建设等各方面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建国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建设不再是一个历史远景，而转化为真实具体的实践进程，“苏联形象”所承载的富强、民主、平等、包融的乌托邦想象不再是一种关于理想国度、遥远未来的设想，而是要通过一系列规划推动切实的进步，以期逐步达成的发展目标与要求。

因此中国对于苏联，不再是单纯的对乌托邦想象的追踪者，而是拥有独立主权、享有平等国家关系的同行者。虽然在初期发展中仍普遍以接纳和学习苏联经验为主，呈现引导与被引导的互动关系，但这种学习模式也逐渐转变为具有批判性、选择性的接受，在整体保持正常友好的交流沟通过程中，既看到其制度优势与政策的先进之处，又吸取其经验教训，认识到其发展中的不足与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凭借在中国革命斗争、文学创作及历史研究等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在国内外享有声誉，先后出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等重要职位，在新中国国家事务、科学文教事业、文学艺术建设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在 1949 年至 1959 年的十年间，郭沫若曾担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在建国初期许多国家尚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大力开展民间外交，努力为中国争取一个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同时也多次出席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为世界保卫和平运动贡献力量，于 1951 年 12 月获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1952 年 4 月 9 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典礼，郭沫若在授奖仪式上致辞，言及“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无上的光荣，也是我们全中国人民的无上的光荣”，并即兴朗诵诗作《光荣与使命》，宣布将十万卢布奖金全部捐献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同年由全苏社会及科学知识传播学会主编费德林撰写的《斯大林世界和平奖获得者郭沫若》出版，序言中费德林肯定了作为社会活动家和知名作家的郭沫若，在中国革命斗争和解放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在当时中苏关系的大背景下，“20 世纪 50 年代尽管中苏的政治关系被称为联盟关系，但在文化上中国依然是被苏联的学界塑造为从属性的存在”，因此在费德林的叙述中，“中国革命划归于苏联世界革命的大战略之下，因而中国革命成为‘次级的’、‘从属性’的革命。费德林还指出：‘像其他中国作家一样，郭沫若受到了高尔基所开创的苏维埃文学的影响’。”[刘亚丁 2016:22-25]足以证明在当时的苏联学界看来，中国无论是改造现实世界的社会革命运动，还是知识分子群体精神世界的建构，都笼罩于苏联的影响之下。

鉴于郭沫若所具备的多重重要身份，以其文学创作为主的文字材料中所呈现出的苏联观，都不仅仅体现出他个人的好恶，而是展现了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以及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新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调整的对苏方针，也反映出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对苏联的主流认知与情感体验。郭沫若在建国后身兼多职，这意味着他同时拥有政界重要人物、科学院首位院长、文化界标杆旗手、外交界知名使者等诸多身份。这些身份与职务使得他能够广泛深入到政治、科学、文化、外交等诸多领域，也使得他对中国现代社会建设进程中，社会现状的变动及国际关系的影响，都能够及时获得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认知。因此当他以中国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和外交使者的双重身份投入到中苏两国文化领域的合作，亲历两国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对苏联这个强大的邻国在中国社会建设中所产生的引导作用和深远影响，会获得更为直观而深刻的感受。这种认知与感受渗透在他所写下的各类文章中，不仅透露出他个人对苏联的看法和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历史现场与社会真实。

从郭沫若个人的履历与活动轨迹来看，他于 1957 年 11 月参加毛泽东率

领的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在 1952 年 2 月任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科学院名誉院士之后，又于 1957 年 11 月获苏联科学院院士称号。这便印证了该阶段中方确需借助苏联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扩大对外交流，在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于共同理想下的历史语境中，增强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政府实行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影响下，郭沫若视苏联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榜样与前景，并试图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普及这种榜样的力量。这种写作倾向在其四十年代建国前的文章评论与公开演讲中已初见端倪，而在这一时期，郭沫若所担任的职务性质更要求他贯彻这一政策与方针，向苏联学习的宣传与号召力度则进一步增强。作为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勃兴的主要推动人之一，郭沫若在一系列公众场合的演说与发言中，都反复提及苏联在科学技术与文艺活动领域取得的突破，做出的成果。在 1954 年 3 月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之际，郭沫若发表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循着斯大林指示的道路前进！》，高度评价斯大林对人类科学事业的进步所作的贡献，号召广大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学习“全心全意、无限忠诚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习他的学说，“从中吸取无穷无尽的思想力量”，学习他亲自培育的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龚济民.1983:96]1955 年 10 月 28 日，郭沫若出席中国科学院、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联合举办的“伟大的自然改造者伊·弗·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时，在开幕致辞中赞扬“米丘林是生物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号召广大科学工作者以米丘林为榜样，以米丘林学说为基础，把科学研究工作同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密切配合起来。[龚济民.1983:136]

在 50 年代郭沫若所作的科学诗中，也具备这一明显的倾向，发表于 1957 年 10 月 25 日的《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的讯号》，将苏联于 10 月 4 日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视作“保卫和平、制止侵略”“科技高超，和平创造”[郭沫若 1983:209-209]的希望之象征，而在 1957 年 11 月 3 日作于莫斯科的《月里嫦娥想回中国》中，随着苏联第二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郭沫若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寄予了极大期望，“我们要努力学习苏联的经验，/再隔几年也能放出星际火箭，/到月球里去把嫦娥接回国来，/让她能愉快地从事和平生产。”[郭沫若 1983:214]这一倾向也不仅局限于对科技发展的展望中，在 1957 年 11 月 6 日发表于《北京日报》的《歌颂十月革命》中，郭沫若写道：“四十年前出现了新的太阳，/四十年后出现了新的月亮”[郭沫若 1983:210]。其中“太阳”正是指 1917 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

主义国家，而“月亮”则指苏联所造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太阳”与“月亮”两种意象，蕴涵着从制度和主义，到科学技术都向苏联看齐的这一导向。

但与 40 年代更偏向于个人认知的单一憧憬与推崇不同，建国后身兼重任的郭沫若具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官方代言人的属性，这使得他的苏联观将实时受到国际形势、中苏关系及中方对苏政策之变化的影响，这些变动也直接映现于不同时期其言说表达中的“苏联形象”及相关意象的不同塑造中。1949 年 11-12 月，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郭沫若曾先后发表两篇纪念文章和两首祝寿诗，据郭沫若研究专家魏建考证，两首祝寿诗“第一首名为《斯大林万岁》，最早见于中国文艺界人士为庆祝斯大林大元帅 70 寿辰赠送的纪念册，后发表于 1949 年 12 月 13 日《人民日报》。第二首诗题为《我向你高呼万岁！》，几乎同时刊登在两个杂志：一是《观察》第六卷第四期，二是《中苏友好》杂志第一卷第二期。在两个刊物上刊登的这一首诗实际上是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除了个别字词、标点、空行等微小差别之外，最大的不同是《中苏友好》版署名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郭沫若’。”[魏建 2011:116-129]显然两首祝寿诗所呈现的郭沫若的身份立场并不相同，第一首诗更倾向于个人写作，享有一定的创作自由度，第二首诗则更近乎于官方行为，是在作为代表完成这一政治外交任务。两首诗作原本都被收入 1953 年出版的《新华颂》，但在 1957 年 3 月出版的《沫若文集》第二卷中的《新华颂》版本中，第一首诗《斯大林万岁》被删去，第二首诗《我向你高呼万岁！》则更名为《集体力量的结晶》。这一更改便在细节之处透露出形势转变的历史讯息，中苏关系已然发生转变。修改后的版本着意去掉具体个人的名讳与称呼，代之以概念指涉更为广泛也更为模糊的集体群像，从塑造伟大人物、个人英雄形象，到强调人民群众集体的意志和力量，这一转变作为一个信号，透露出随着苏共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否定愈发彰显，郭沫若本人的意识及其所代表的中方的观念也在逐步发生微妙的变化。

郭沫若始终葆有捍卫中国尊严及利益的坚定立场。中方对苏方针的调整与变化，直接影响到他对苏联的态度，也直接体现于他的行为和表达中。在一定意义上，由于郭沫若的特殊身份，他的言行态度及文字表达都会释放出政策及形势变动的信号，并具有一定的宣传效应。20 世纪 60-70 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郭沫若心目中的苏联形象由正面转向负面，他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发起严厉抨击，并参与到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中。1959 年 6 月 4 日，横跨欧亚大陆的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联运快速列车正

式通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开通的首列国际联运客车，此后六十年间，这趟著名的“国际列车”见证了中俄两国关系多次转折与嬗变。1963年9月7日，在苏联边境站纳乌什基发生苏联当局无理扣留列车的事件，出于对本国正当权益的维护，郭沫若针对这一事件作出明确表态，于17日写下《抗议纳乌什基事件》一诗，发出谴责与控诉。在该诗作序言中，对创作背景及意图作了明确说明：“1963年9月17日我外交部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斥责苏方于9月7日在纳乌什基边境站武装围劫我国国际列车。阅后成此。”可以说这一诗作正是对外交部抗议的声援，较之理性严谨的官方声明，个人的诗作更显露出强烈的感性情绪，以激烈的措辞表达内心的愤懑。创作于1963年7月23日的《天外人归》，则是在“1963年7月5日，邓小平同志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谈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7月21日，代表团回国，毛主席、周总理等亲自到机场欢迎”这一背景下写就，“半月长谈争正谊，/四方公论明真相。”他指出历史终将会证明事实的对错——“有人民/历史转车轮，/宣判状。”[郭沫若 1984:16-17]此外他在《斥投降主义者》《读〈关于斯大林问题〉》等一系列诗作中都对“苏修主义”提出抨击与批判。

在中苏关系破裂的大背景之下，郭沫若笔下曾经担任和平使者、社会主义引路人、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先进、正义、和谐、友好、包容的苏联形象发生急剧转向。出于对本国尊严及权益的捍卫，他毫不留情地批判曾经的“偶像”，对中国汲取苏联的经验教训，走上与苏联不同的、真正贴近于人民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新的展望。

结语

郭沫若在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中扮演多重重要身份，在中国现代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建构、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对外交流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郭沫若涉及俄苏及中苏关系的文史材料为研究对象，将他对俄苏思想文化的接收、对苏联经验与社会体制的观感、对中苏文化交流的态度作为突破口，分为三个阶段，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源自俄苏的影响因子作一考察，不仅在政治外交层面，也在深层次的精神文化层面，探知当时真实的中苏互动与交流情况。

在经历“五四”前后从俄国文学与十月革命中汲取精神力量与革命资源，到抗战时期对苏联模式的推崇与追慕，再到建国后由全盘学习转向分歧这一整个历史进程后，在对俄苏各类思想文化资源的批判性接受中，中国完成了对自身通向现代化道路的建构，推动了自身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进程，并以完全独立自主的姿态，重新与周边国家寻求和谐稳定的双边交流，打开共同

促进人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 高尔基著,戈宝权译.论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2. 戈宝权.“五四”运动前后俄罗斯古典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国外文学,1991.
3. 龚济民,方仁念著.郭沫若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4.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
5. 郭沫若,蒲风.郭沫若诗作谈.现世界创刊号,1936.
6.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2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7. 郭沫若.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的讯号.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8. 郭沫若.匪徒颂.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9. 郭沫若.歌颂十月革命.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0. 郭沫若.孤鸿.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1. 郭沫若.巨炮之教训.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2. 郭沫若.苏联纪行.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3. 郭沫若.天外人归.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5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4. 郭沫若.新时代·序.新时代.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15. 郭沫若.月里嫦娥想回中国.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6. 郭沫若.中苏文化之交流.上海:上海联合发行所,1949.
17. 郭沫若与苏联各界往来函电(1941 年-1946 年).郭沫若学刊,2009.
18. 河上肇著,郭沫若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19.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0. 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鲁迅大全集 6 创作编 1932-1933.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21. 李玉贞.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一个侧面——孙科与中苏文化协会.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22. 刘奎.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23. 刘亚丁.郭沫若的两篇俄文轶文——兼述郭沫若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文化交流中的作用.郭沫若学刊,2016.

24. 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编. 郭沫若集外序跋集.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25. 王锦辉.中苏文化协会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10.
26. 魏建.《沫若诗词选》与郭沫若后期诗歌文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
27. 周恩来.我要说的话.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第二版).